

工运先驱邓培生平若干问题的考证

王士立

邓培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和优秀活动家。生于1883年4月8日,广东省三水县(今佛山市三水区)人。1900年至1925年在唐山铁路工厂(今唐山机车车辆厂)做工。1921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今河北省区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历任中共唐山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书记、中共北方区委委员、中共第三、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和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等职。1925年秋脱离生产,成为职业革命家。1926年以后担任全国铁路总工会驻广东办事处主任。1927年4月22日在广州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邓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的英名存幽燕,浩气贯南粤。他为我国早期工人运动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对邓培的研究一直存在资料不足的困难。邓培同志生前没有留下自传材料,文字记载很少。解放后研究邓培生平,主要靠一部分老工人、老党员的回忆材料,由于时隔久远,说法不一,有些材料属于误传,如果不作进一步鉴别研究,就轻易引用,难免以讹传讹。笔者就多年来所得资料,对邓培生平的若干问题作一些考证,提供党史研究工作者参考。或有不妥之处,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一)关于邓培的诞生时间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九卷《邓培》的文中说:邓培生于1884年(清光绪十年),月日未详。《冀东革命史》、《八十春秋》(唐山机车车辆工厂史),以及前些年见到的所有关于邓培的传记文章都是

这样说的。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关于邓培的陈列材料也说是生于1884年。经过考证,这个时间是错误的。根据邓培的母亲黄带的回忆,邓培生于1883年(清光绪九年)4月8日。黄带于1949年逝世,生前曾叫她的孙女写下她们全家三代十口人的生辰时间,这大约是抗日战争以前的事。这些生辰时间后来又由邓培的长子邓国强抄在另一个本子上,保存在身边。本子上明确写道:“父邓培生于元前二十九年四月八日(三月初二辰时)”。元前二十九年即中华民国元年前二十九年,是公元1883年。经过查对紫金山天文台编算的《新编万年历》,公元1883年4月8日正是农历癸未年三月初二。

为什么邓培的诞生时间这些年来一直传为1884年呢?这是由于邓培的大女婿袁兰祥曾经在1960年给广州市民政局革命烈士传略编写组,写过两封信,信中说:“邓培烈士生于1884年4月8日”。他的依据是:邓培1927年“牺牲时是45岁”,他说:“这是按旧法算的,改按整岁算应是1884年生。”(见广州市民政局档案资料)其实袁兰祥并没有算对,1927年虚岁45岁,周岁则是44岁,正是生于1883年。

(二)关于邓培的家庭情况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九卷《邓培》的文中说:邓培的“家境贫寒,祖父是产业工人,父亲和伯父、叔父都因生活所迫,去美国旧金山做苦工,最后葬身异国。”这些说法有许多不正确的地方:我们曾于1983年8月到邓培的故乡广东省三水县石湖洲,访问了邓培的堂弟邓玉安和本村老人邓本忠,他们提供了邓培家庭的详细情况。邓培的家境确是贫寒,但祖父不是产业工人。他的祖父邓善书兄弟4人,原来都是农民。后因生活所迫,邓善书离开家乡,漂泊到美国旧金山,在一家种植园中做苦工。邓善书苦干了好多年,后来经营一个果园,但不久,因遭大雪,果树全部冻死。邓善书在破产的打击下,又返回故里,继续务农,后来在贫病中死去。邓培的伯父幼年夭亡,根本没有去过旧金山。邓培的父亲邓文高,起初

以种田为生,后来到广州当了雕花木工,邓培出生一年多邓文高就病死了,他也没有去过旧金山做苦工。只有邓培的叔父邓文坚在邓善书离国数年后,去了旧金山,邓善书回国时,他仍留在那里做工,若干年后,失去音信。邓培的父亲去世以后,家中只有三亩沙田和一间旧房,寡母黄带艰难地带着邓培靠种田和织鱼网度日。

(三)关于邓培的入党时间

关于邓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间,党史界有不同的说法。笔者对于这个问题曾进行长时间的调查和考证。

1960年11月,中共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张星北、王桂荣到湖北大学,访问了原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罗章龙,他认为邓培是1922年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远东民族大会)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罗章龙说:“邓培通过参加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就已经创造了入党条件。他实际上也为党作了些工作,同时象邓培同志这样工人代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早已注意了他。但那时入党没有入党仪式、介绍人和审查等严格手续,就是提个名,大家研究一下,再经过一段考验;再研究一下,就把邓培同志叫到北京正式谈一下,就算入党了。至于邓培入党和唐山建立党组织的具体时间不记得了,较有把握的是:在召开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以前他不是党员,他是从苏联回来,还经过一段时间才入党的,但时间也不会太长。另一个是在1922年唐山的大罢工以前就有了党的组织,首先是在京奉路建的党,而且以唐山南厂为最早,而唐山建党以前,邓培同志是最早的党员。”(唐山革命史档案)。

在这以后不久,我们看到邓培的大女婿袁兰祥提供的回忆材料说:邓培是在赴苏参加远东民族大会期间入党的,“参加了第三国际东方局中国支部。”袁兰祥与邓培关系密切,他记忆力过人,这个情况会不会是邓培生前告诉他的呢?但找不到佐证材料。1961年4月,笔者带着这个问题和唐山机车车辆工厂的石忠又一次到湖北大学访问了罗章龙。罗章龙仍然认为邓培是1922年参加远

东民族大会回国后入党的。他说：“1921年冬天，我们叫邓培同志当东方民族大会代表时，就打算吸收他入党了。以后我不断地将他的工作情况汇报给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2年春邓培从苏联回国后不久，就入了党。因为当时我和他联系较多，他在东方民族大会上表现很好，唐山要建党，我就向李大钊谈了他的情况，决定吸收他。首先我们把他请到北京，征求了他的意见。你们说他在苏联入党，我不知道。可能当时张国焘和他谈过入党问题，但党籍问题是在回国后才解决的。他刚回国时，我还没有得到‘同志’印象。当时第三国际有东方局，但东方局都是苏联人，没听说有中国支部。”（唐山革命史档案）。

六十年代初年，我们编写的《八十春秋》（唐山机车车辆工厂厂史）和中共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冀东革命史》，关于邓培的入党时间，就是根据罗章龙的说法写的。

但是，后来罗章龙改变了这种说法。“文化革命”过后，罗章龙接受各处同志访问，他自己也写了不少回忆录，都说邓培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比如：1980年2月，他在《亢斋回忆录》中说：“北京共产主义组织开始有：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和李梅羹等，随后几个无政府主义者加入，但旋又退出了。后来加入的有邓培、缪伯英、邓康、高尚德和史文彬等。”（《回忆李大钊》第38页）1982年5月，笔者写信给罗章龙，提到他近年的回忆材料与1960年11月和1961年4月的说法有异，询问邓培究竟是不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6月1日，他复信说：“邓培是第二批加入中共北方小组的成员。”

1982年9月，笔者又到北京访问了罗章龙。他承认“关于唐山的状况，和许多人谈过，可能有不一致的地方。”关于邓培的入党时间，他表示应该以现在发表的回忆录为依据。

1983年5月，笔者和中共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的王树信、张亚兴再次访问了罗章龙，他仍然认为邓培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是中共“一大”召开以前的党员。5月30日，他进一步认定邓培是

1921年春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

但是,罗章龙的上述说法没有其它材料可为印证。原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有两处涉及邓培的入党时间问题。第4篇谈到邓培参加远东民族大会的情况时说:“铁路工人代表以邓培为首,他是唐山老资格的广东籍机器工人,后来加入中共为党员。”(第一册第184页)“后来加入中共为党员”,指什么时间,不够明确。在第2篇第5章中,谈到1920年下半年到1921年上半年,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情况时,张国焘写道:“唐山铁路工人中有邓培、梁鹏万两人参加北京小组,是较早的工人党员。”(第一册第124页)但在第2篇第2章《北京小组的形成》中,他列举了1920年11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5个成员中的11个人名单,没有邓培。如果联系1921年7月张国焘在中共“一大”会议上所作的《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载《“一大”前后》(三)第1—9页)内容来考察,邓培不可能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张国焘在报告的开头就说:“同志们,北京共产主义组织仅仅在10个月以前才有的。此外,加入这个年轻的组织的,只是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他们多半缺乏革命经验。”这就是说在中共“一大”以前,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都是知识分子而没有工人。应该说1921年7月留下的张国焘的这份报告,较之1971年他写的内容含混的回忆录,更值得我们重视。

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包惠僧,1978年8月回忆说:“当时在‘一大’会议上曾报了一下各地的名单。我记得一共是30人左右。”他列举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名单只有7人,没有邓培。(见《“一大”前后》第374—375页)

1960年,中共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同志曾经访问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另一个成员朱务善。他说:“我认识邓培大概是1921年底,当时邓培同志已是党员。谁介绍入党的不知道。”(唐山革命史档案)也没有肯定邓培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

六十年代初,原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刘仁静,以及吴雨铭等

人的提供材料,对邓培是不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问题都说不清楚。(唐山革命史档案)

因此,关于邓培在中共“一大”前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说法是不能确立的。罗章龙本人经过进一步思考和回忆,后来也放弃了这种说法。

1984年9月,罗章龙由三联书店出版了他撰写的《椿园载记》一书中说:“1921年,经我提出,最后经过北京区委的讨论研究,决定发展邓培为中共党员”。(第190页)北京区委是中共“一大”以后成立的,也就是说,邓培的入党时间是在中共“一大”以后。

1986年11月10日,罗章龙给中共唐山市委党史办公室写了一封信,对这一点说得更为明确。该信全文如下:

“中共唐山市委党史办公室:

来函所询关于邓培同志入党的确切时间,由于年代久远,我已不能详忆,大致可作如下回答:

一、邓培入党是在1921年,是最早的一批工人党员,大约与史文彬同期。

二、如更详细些,大致在党成立后(7月)和年底他去参加远东民族大会之前。

三、他入党是由团转党还是直接入党,或在次年转正等,已不能准确回忆了。

以上各节,仅供参考。

此致

敬礼!

罗章龙

1986年11月10日”

罗章龙关于邓培入党时间的说法不够准确,又几次有变化,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困难。但是,罗章龙是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早派到唐山和邓培联系的人,又是邓培的入党介绍人,1921年—1926年间,他长期与邓培在一起从事铁路

工人运动,因此关于他的回忆材料不能不加以重视。笔者认为,在没有其它文献资料提供证明以前,关于邓培的入党时间只能以罗章龙最后确认的时间为依据了。

罗章龙说:邓培大致在党成立后(7月)和年底他去参加远东民族大会之前入党的。已知邓培于1921年10月下旬离国去苏俄参加远东民族大会的,而1921年9月,邓培列席参加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扩大会议时,还不是党员。(1982年6月1日罗章龙致王士立的信;1982年9月26日王士立访问罗章龙记录)因此,邓培的入党时间大致是1921年9、10月间,即1921年秋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共党员的。这个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

本文不厌其烦地引用一些材料,目的在于说明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经过,以供有关同志进一步研究时参考。

(四)关于邓培领导建立唐山第一个产业工会的时间问题

唐山第一个产业工会是邓培领导建立的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工会。它是何时成立的呢?《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九卷《邓培》的文中说:“邓培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指导和帮助下,对唐山制造厂原有的‘职工同人会’加以整顿,于1921年春,建立起唐山第一个工会组织——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工会。”这种说法是引自《八十春秋》。

但是这个时间并不准确。六十年代初我在编写《八十春秋》时,见到张国焘写的《“二七”前后工会运动略史》一文中说:“五四运动的时候,京奉铁路唐山南厂(即唐山制造厂——引者)工人即开始组织职工同人会,……做种种爱国运动。后来爱国运动渐渐消沉下去,职工同会人的色彩也渐渐改变,直到民国十年,遂变为纯粹的工会组织了。”(见《新青年》1925年第2期)民国十年,即1921年。故而《八十春秋》采用了“1921年春”这个时间,这实在是不得已的说法。

经过近年来的考证,我认为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工会是1920年12月底成立的。不久以前,我们从中央档案馆发现原唐山制造

厂工会委员、共产党员王麟书 1925 年在莫斯科学习时写的《个人情况报告》中说：“1920 年（在）京奉铁路职工会被选担任秘书职务”。这个时间应该是可信的。这就是说京奉铁路职工会（即指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工会）在 1920 年间就成立了。究竟是哪一个月呢？王麟书的《个人情况报告》没有说清楚。

现在我们分析一下：

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 1920 年 4 月派罗章龙到唐山与邓培建立了联系。据罗章龙说：开始见到邓培，谈的是组织爱国运动的问题，以后谈到了十月革命，大约半年以后，才谈到组织工人的问题。（见 1961 年 4 月《访问罗章龙记录》）这就是说，唐山制造厂组织工会是 1920 年 10 月以后的事。

据当时的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谌小岑 1975 年回忆说：1920 年 11 月，他曾来到唐山见到邓培，当谈到应该如何组织煤矿工人的时候，邓培说：煤矿工人成份复杂，唐山的工人运动应该首先成立铁路机车厂工会，第二步再组织启新水泥厂工会，然后才能进行组织煤矿工人的工作。（见《我在工人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一文）可知 1920 年 11 月，唐山制造厂工会尚未成立。

谌小岑后来又回忆说：1920 年 12 月底，他曾陪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张国焘到唐山，和邓培等人讨论唐山工人运动和组织唐山制造厂工会问题。（见《李大钊先生与觉悟社》一文）唐山制造厂工会即成立于张国焘此次来唐以后，因此王麟书的《个人情况报告》才有 1920 年担任职工会秘书的内容。

1920 年 12 月底建立的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工会，是中国北方建立的第一个产业工会，比 1921 年 5 月建立的长辛店铁路工会要早一些。

（五）邓培是否参加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第一册中曾写道：1922 年 5 月 1 日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推举黄焕廷、林伟民、谭平山、邓培、谢伯英等五人为主席团。”（第 224 页）《伟大的开端》书中也说

出席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代表有京奉铁路工会代表邓培。这种说法是不可信的。邓培没有出席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请看以下史实：

第一、1921年下半年，共产国际决定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共北京区委、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和李大钊同志指派邓培作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代表参加了中国代表团；同时指派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的另一名工人梁鹏万作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出席大会。1921年10月下旬，他们以回广东探亲为名，向厂方请了三个月假，一起秘密前往苏俄。1922年1月21日，远东民族大会在莫斯科开幕，2月2日闭幕。3月间，邓培和梁鹏万才回到唐山。由于超假，梁鹏万被厂方开除了。而邓培因为是手艺高超的旋床工匠，没有被开除。在这样的情况下，邓培怎么可能在1922年4月间又离开工厂前往广州，参加5月1日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呢？

第二、我们从中央档案馆查到1922年4月21日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负责人邓培和阮章致上海青年团总部代理中央机关方国昌（即施存统）的一封信，报告了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将派出代表赴广州出席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信中说：“唐山代表是树彝先生。他去的时候，不足旅费完全由我们向债主借来，一切困难是不用说了，只希望你们能允再寄10元以上的款子为好，因为我们是借了20元的。”此信可以证明，1922年4月21日时，邓培尚在唐山为李树彝赴粤筹款，没有提到他要去广州开会之事。

第三、据1922年5月24日上海《新申报》载《全国劳动大会之所闻》明示：“唐山京奉路机务处同人联合会代表李树彝”。可进一步证明代表唐山铁路工会参加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代表不是邓培。联系上文，邓培、阮章在信中所陈述的经济困难情况，可以推论李树彝既代表唐山铁路工会出席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同时又代表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出席了1922年5月5日在广州召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六)关于邓培领导的1922年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罢工和开滦煤矿罢工的时间和人数

邓中夏同志所著《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说:1922年“9月4日京奉铁路山海关机器厂工人的罢工,……计罢工8日”。“与山海关约定同时并举的有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工人,因准备不及,延于11月罢工,火车并未停,参加者2000余人。”(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8—29页)这里所说的京奉铁路山海关机器厂应是山海关铁工厂。“9月4日”罢工,系“10月4日”之误。(见天津《益世报》1922年10月7日)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工人罢工的时间是10月13日—20日,不是11月,参加人数是3000人。(见北京《晨报》1922年10月17日、10月23日)。

邓中夏同志所著《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又说:开滦煤矿于“10月23日首由唐山、赵各庄、林西、唐家庄四处同时罢工,26日马家沟亦罢工。”(第81页)但据开滦煤矿资料记载,10月23日与唐山、赵各庄、林西、唐家庄四矿同时罢工的还有开滦矿务局秦皇岛管理处码头工人。马家沟矿工人由于受到矿方便衣警察的严密监视,未能同时行动,延至11月1日才参加同盟罢工。

胡华同志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中说:“10月23日,爆发了著名的开滦煤矿3700多工人的大罢工。……罢工的人数后来增加到两万多人(包括开滦五矿工人、秦皇岛码头工人、唐山铁路工厂工人、京奉铁路工人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9年9月版第85页)上述说法不够准确。据开滦煤矿、唐山机车车辆工厂、启新水泥厂的历史资料记载:10月23日,开滦矿务局所属唐山、赵各庄、林西、唐家庄四矿和秦皇岛管理处码头工人同盟罢工,人数远远超过3700人。11月1日,马家沟矿加入同盟罢工后,五矿一处罢工工人人数达到3万人。10月28日,启新洋灰公司工人为支援开滦工人举行同情罢工,参加者8000人。至于唐山铁路工厂工人是在10月13日—20日罢工的,10月23日以后并没有举行罢工。

(七)关于邓培是否担任过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职务?

唐山的学者在1961年见到曾任全国铁总委员长的袁兰祥在1960年致广州市民政局革命烈士传略编写组的信,他说:“1925年5月,邓培参加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当选为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我看过铅印文件,说邓培是全总副委员长。”袁兰祥原是唐山铁路工厂工人,曾随邓培学徒,后来成为邓培的大女婿,与邓培的关系密切,了解邓培的许多革命经历。他的记忆力过人。因此他的话曾引起我们注意。但是一直找不到其它佐证,我们没有轻易认定。

邓中夏于1930年著有《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解放后重新出版。该书说:1925年全国二次“劳大”选举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25人,邓培是其中之一。执行委员会推举林伟民为正委员长,刘少奇、刘文松为副委员长,邓中夏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李森为组织部长,孙云鹏为经济部长(人民出版社1953年11月北京第2版第170页)。1957年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编:《中国历次劳动大会文献》出版,该书也说:1925年选出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长是林伟民,副执行委员长是刘少奇、刘文松,邓中夏是秘书长。邓培是25个执行委员之一(见该书第31页)。关于副委员长人选可能是受了邓中夏所记的影响。有了这两本文献作依据,我们便否定了袁兰祥的说法,以后许多年都认为邓培只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执行委员。

20世纪80年代以后,见到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工会工作手册》,其中提到1925年时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副委员长有刘少奇、邓培、刘文松(见该手册第120页、第956页)。因此关于邓培的任职问题再次引起我们的注意。

1995年四五月间,有两位工运史的专家先后给笔者来信,一位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唐玉良研究员,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明逵研究员。他们都指出:关于1925年成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人选,过去有讹传。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误将刘文松记为副委员长,而漏记

了另外两名副委员长：邓培和郑泽生。其依据是：《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5月18日第六版一则报道：《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后之进行》，其中说：“……于五月七日开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互选林伟民君为正执行委员长，刘少奇、邓培、郑泽生三君，为副执行委员长。”又说：戴卓民任全总秘书部主任，邓中夏任宣传部长。这是事隔仅11天当地最权威的报纸报道，应该是可信的。而邓中夏的书是事隔5年之后在莫斯科根据回忆和不完全的资料写成的，难免有错误。比如据有关专家研究，他对二次“劳大”选出的全国总工会25名执行委员只写出17个姓名，其中7人是错的；另列了4个人的姓，其中3个是错的。在这类具体史实方面，邓中夏的书显然不如当时当地的新闻报道可靠。《广州民国日报》所载，是1960年袁兰祥的说法有力的佐证。我们可以认为1925年邓培担任了全国总工会的副委员长。

(八) 关于邓培牺牲的时间

邓培于1927年4月15日在广州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不久就被杀害了。但牺牲的具体日期一直不详。询问邓培烈士的亲属，他们也不清楚。广州铁路工人曾伟赞曾回忆说，是被捕后两天（4月17日）被杀害的，并不准确。1927年9月3日出版的《醒狮周报》第146—147期，发表了朱忱薪的文章：《中国共产党运动之始末》（续），写道：

“广东为共产党之大本营，其牺牲最重，政府当局于4月15日下令搜捕共产党，即由军警机关捕获二千余人，22日之夜，将重要分子秘密执行枪决，外间已晓之姓名如下：

一、刘尔崧，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工人部长，广州工人代表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二、李森，中华全国总工会驻粤办事处主任。

三、肖楚女，黄埔政治军事学校体育主任。

四、何耀全，省港罢工委员会执行委员。

五、毕磊,广东中山大学学生会执行委员。

六、沈春雨,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秘书长。

七、刘剑雄,缉私卫商处巡辑队主任。

八、邓培,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驻粤办事处主任。

九、容保辉,广州公安局政治指导员。

十、李浚,黄埔入伍生政治宣传员。

十一、陈辅国,同右(即同上,原文为竖排,故曰“同右”——引者)。

十二、熊锐,同右。

十三、邓子超,黄埔入伍生第三营营长。

十四、雷鸣甲

十五、胡超”(该刊第19页)

据此可知,邓培是1927年4月22日在广州遇难的。从而解决了一个多年的悬案。这是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九卷《邓培》作者的研究贡献。

(王士立,唐山师范学院教授,唐山市历史学会名誉会长)